

GAI
GE

從改革到革命

GE
MING

王德昭著

從改革到革命

王德昭 著

中華書局

從改革到革命

Cong Gaige dao Geming

王德昭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9³/₄印張·1插頁·223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400冊

統一書號：11018·1406 定價：2.5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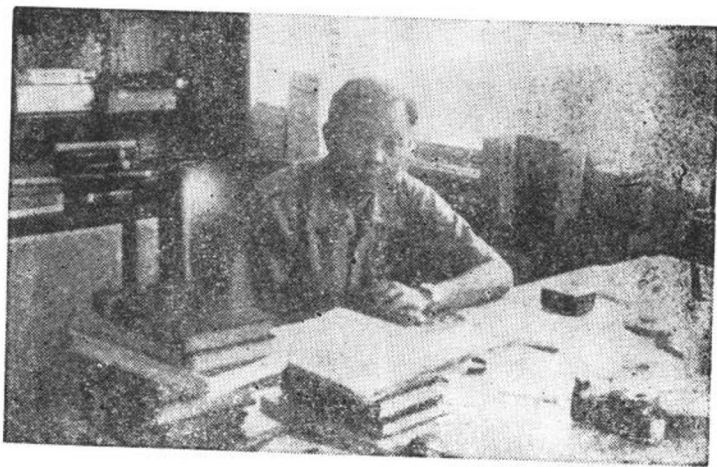
ISBN 7—101—00143—2/k·61



王德昭教授遺照



王德昭、巫省三 1935 年 12 月 22 日因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北大史學系二年級同班為歡迎他們出獄留念合影。前排中立者為王德昭，右起第一人為巫省三；二排左起第二人為提供照片者余行邁；前排右起第二人為判定此照性質者金寶祥；後排右起第一人為孫思白。



作者攝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室。

出版說明

王德昭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本書是他生前應我局之約，自己編定的中國近代史論文集。所收九篇論文，內容包括對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秦力山、孫中山以及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有關政治、思想、文化的論述，故他把這本結集題名為《從改革到革命》。書中最後三篇原是用英文寫成的，他本想自己譯成中文，可惜天不假年，尚未動手而溘然辭世。其後，王夫人約請陳萬雄等八位先生代為譯出。

王教授先後執教於貴州、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國內外大學凡四十年。書前，王夫人陳琬女士撰文介紹其生平事略；他的同學、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孫思白同志追憶他北大求學時代生活，都有助於讀者對他的了解，所以，對他的生平、事業這裏不再贅述。

王先生的遺著《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我局也於1984年影印，在國內發行。

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

1985年5月

王德昭教授之生平事略

王 陳 琬

先夫王德昭，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二日生於浙江省嘉興縣石佛寺鎮。排行第七，有四兄二姊。因家境清寒，勉全力僅能培植長兄習醫。惜其長兄於學成後正要行醫之時，患肺病咯血去世。德昭每憶當時父母親相擁痛哭之淒慘情景，總是悲嘆不已！除兩姊在家助母料理家務外，諸兄皆以足十二歲即送出家門，學做生意。德昭自不例外，幼時在私塾略讀古文，插班到新式學堂五年級，以一年半讀畢小學。隨即送到一布店中當學徒。幸商家伙食尚豐厚，得使其童年健康成長。店東和經理等對德昭亦甚愛護，每晚在關店門之後，必令其讀書習字，使其學業不廢。但一般兒童所受之初中教育，德昭則無緣接受。

一九三〇年夏，杭州創辦了一所“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主旨是爲培養一批專辦成人教育的人材。學制分專修和師範兩科。專修科，必需高中畢業始能投考；師範科則初中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可以投考。兩者程度相等於普通專科學校及高中。德昭以同等學力考入該校師範科。該校學雜宿費全免，伙食費亦由縣府供給。但德昭未讀過初中，最初在學習上與一般同學相較，自有困難。德昭以異常之努力，急起直追，在第三年，已是班上英語及數理科最高分之學生。化學老師並請其在實驗室當助理。畢業以後，得校長尚仲衣博士的鼓勵和資助，赴北京投考大學。因而德

昭之一生，受該校之影響至鉅。對尚仲衣博士及其中多位老師教導扶掖之恩，更是永誌不忘。

按當時教育部之規定，凡師範科畢業學生，必需服務一年以上，始能投考國立大學。故德昭先在中法大學化學系肄業一年，然後於一九三四年夏再投考北京大學歷史系。學費及生活費，因無家庭的支持，歷盡艱困。爲無錢買英文課本，有一位善心的同班同學趙春谷君（現在在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教）在上課之前，必先送書來讓德昭唸一遍，才同去上課。德昭平時常寫稿和翻譯文章，投寄報館或雜誌社以換取稿費來維持生活。德昭其時寫稿甚多，但日後從未提及自己以前的難苦生活。只在他逝世前數月，爲鄭天挺老師祝壽文中，才略述及在北大時之往事。琬草此文，亦僅以見他生平一二而已。

一九三七年八月，對日抗戰開始，德昭即返浙江家鄉，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後聞北大、清華以及南開三大學，合組臨時大學，在湖南長沙開課，即自家鄉輾轉至長沙就讀。課餘，曾爲《火線下》（三日刊）寫社論，後又爲《觀察日報》寫社論，任編輯。德昭日間需返學校上課，夜間復爲報館工作，每日之睡眠時間，僅兩三小時而已。

不久，南京淪陷，長沙軍事形勢緊張，臨時大學決定西遷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部分師生各採用不同交通工具直赴昆明；德昭則參加學校所組織之步行團，由長沙經貴州省，步行至雲南昆明，完成其最後半年之大學學業。

大學畢業後，曾在貴州任中學教員兩年。一九四〇年秋，至重慶《益世報》任國際版編輯。後又至抗戰前綫河南葉縣任“三一出版社”社長，兼辦《華中日報》。

一九四二年春，應國立貴州大學之聘，至貴陽花溪貴州大學歷史系任教，凡五年。其時著有《中原歸來》、《戊戌政變》及《各國在

華領事裁判權》等書。

一九四七年，應台灣師範大學之聘，至師大歷史系任教。其間著有《怎樣教歷史》、《文藝復興》、《國父革命思想研究》等書。譯著有《中國美術史導論》及《西洋近代思想史》。

一九五五年，德昭考取留美公費，至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哈佛大學原給予“訪問教授”之名義，但德昭自願繳費註冊，成為正式學生，以一年時間完成碩士學位，再恢復原有名義。因公費僅兩年，遂依約返師大授課。

一九六二年，德昭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任教歷史系，半年後升任系主任，後又任文學院院長及校務行政委員等職。

一九六六年秋，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至香港中大歷史系任教。一九七二年任歷史系主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副主任。曾主編《中文大學學報》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並曾出任中大文學院院長。

自一九七七年退休以後，仍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院之學生攻讀高級學位及撰寫論文。

德昭一生，勤於研讀及著述。在一九三六年初，已在《東方雜誌》及《時事類編》等發表文章。在大學任教近四十年，對學生之學業，無不盡心指導，關懷備至。待人忠摯誠懇，凡師友有所委託，必全力以赴，徹夜趕辦。原擬於完全退休之後，再以全副精神整理自己歷年之讀書札記、研究心得編印成書，作為對學術之貢獻。孰料天不假年，驟然棄世，未竟其志！

自三月中旬起，德昭稍感不適，但仍不眠不休，伏案工作。三月二十一日傍晚，正在整理其遺著《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之校樣，突患腦溢血症，請醫生來家診視，僅數十分鐘，即陷於昏迷狀態，送至醫院，亦無法搶救！延至三月二十三日清晨，即與世長辭！

德昭病發之初，僅向我說：“這次好了以後，我一定會好好休息

了”；這是表示我屢次勸他休息的一點悔意，但對他的甚多遺稿，却未有一語交待。豈知上天已要這過於辛勞的人，從此永遠休息，永遠不再工作了！

王陳琬泣記

一九八二年五月

附 記

本書七、八、九的三篇論文，乃德昭到各國參加東方學者會議時，所宣讀之英文論文，今承陳萬雄、陳善偉、林啟彥、周佳榮、何炳堅、符兆馨、陳健熊、柳立言各位先生之協助，得翻譯成中文，不勝感激，特在此謹表謝忱。

王陳琬謹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追念王德昭教授

孫 思 白

德昭兄和我是一九三四年夏天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我們同班有二十幾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同班人數不多，彼此認得是容易的。但“熟悉”却談不上；因為大家住得很分散。但是對德昭這個人，却是在榜示未揭曉以前，我已於沙灘街上注意到他。他是一位神采精悍、話音很響亮的人。及至同堂聽課，回答問題，可以看出他思路的明哲與敏捷。

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上學期，即一九三五年冬，發生了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在這場延續了十七個月之久的運動中，我和德昭有了較多的接觸機會，到這時才說得上比較熟悉起來。但從“七七”事變起，同學分散，天各一方，德昭和我有五年不見，到一九四二年夏在重慶一遇；一九四五年秋他從貴陽來重慶（他在貴州大學任教），是又一次見面。我送他和同學何佶（即呂熒）回貴陽，在長江南岸一家小旅館中共住一夜，翌日晨揮手上車，從此，我們就又分別了。第三次重晤是一九八〇年的春初，我正在北京中醫院住院，突然，我的內人把他引到我床前，說了聲“德昭先生來看你”。我睜大了眼注視着他，他也看我，却幾乎“相見不相識”了！從重慶江邊小旅館到北京病院，三十五年過去了。在“既往矣”的三十五年的歲月中，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古舊的祖國從衰老孱弱展現出挺秀的英姿，而朋友們呢，却讓青春的鬢髮染上一層霜白

了。然而，人是健在的，精神是爽朗的，話語是照舊的。我扶病出院，終於和幾位在京舊友，共看了沙灘、紅樓，遊覽了北海，暢敘了兩日。接着，一九八〇年夏季，他應南開大學鄭毅生老師之邀自港來京轉赴天津參加明清史討論會；一九八一年九月下旬再回國來參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和學術討論會；兩次都到我在京的新居來聚晤。後一次還有他的愛女其方和青年教授的快婿 James R. Pusey（華名蒲嘉珉）一道歡談。他向我提出晚年想回到國內來工作和定居；在這次分別後，我正秉承他的意念協助他作實現其這一願望的安排，不料，噩耗傳來，他猝然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三日竟作古人了！他的年齡比我還小了幾歲，正當他的學問有了頗厚的根底、思慮也更加密緻和成熟的時候，不幸辭世，這損失應不是僅屬於私人友誼之間的事。

德昭一生的成就主要是在教育與學術事業上。但他在學術上出成果，主要是在大學畢業後海外的三十年間。而這三十年間恰是我們長期隔絕之後的事。在今日悼念他的時候，對他遺留的史學論著我一時不知該講些什麼，而我想到的首先仍然是身在大學時代的一些片斷。

如前面所說，我們進入北大的第二年發生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在運動發生之前，對當時華北危機的關懷與表態，在校園中曾有所醞釀。但是對結隊走上街頭去遊行的具體日期，北大的學生似乎知道消息較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那天午後，當一隊遊行的學生來到沙灘北大一院門前呼喊著抗日救亡口號時，教室中學生們才從樓窗口望見外邊發生的情況。有些同學正要離開座位，丟下書本準備走出去時，突然一陣急促的鐘聲“噹噹噹”打響了。聽到這不同尋常的鐘聲的同學們紛紛地從課堂、圖書館、宿舍中衝出來。有人臨時扯破了一條床單，寫上水墨淋淋的“北京大學”四字，用兩根竹竿撐起，帶領着臨時集合起來的幾百個同學加

入了遊行隊伍。⁽¹⁾ 這個敲起鐘聲的是誰呢？事隔四十多年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王德昭。⁽²⁾

一周後，更大規模的一二·一六遊行，事先各校都有了較好的組織準備，北大也是這樣。但在當天早晨北大大學生還沒集合之前，德昭在從西齋到新四齋的沙灘街上已被警探捕去，囚禁起來，所以他沒有能參加那天的示威遊行，後來經過營救被釋放之後，他曾在給他愛人陳琬女士的一封信中縷述他被捕後的經過。這封信曾以《寄婉》為題刊於《北大週刊》的《一二一六示威特刊》上。⁽³⁾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當時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思想境界。

自那之後，我的印象裏德昭的生活是活躍的、進取的，和一切堅決主張抗日的同學在思想認識上是契合的。他屢被選為我們班的代表，在學生會中似曾擔任過什麼職務，因為我記得在一年多裏公佈的學生會議通告上，常常有“記錄：王德昭”五個字。還記得我們曾共同在校門口執行過糾察隊的任務；曾共同作為歷史系學生代表為我班被開除的同學向學校當局進行說理，要求“收回成命”。直到西安事變後，我們同班五、六人包括德昭在內曾共同組織起來自發地學習過新哲學。雖然德昭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在這場運動中“只是在外圍搖旗吶喊的一人”；⁽⁴⁾ 就算真如他所說吧，我作為他的老同學，他的“吶喊”的聲浪在我的記憶裏，並沒有息滅。

與熱情始終飽滿，為專心救亡連課也顧不得再上的某些同學比較，德昭在一段時期之後，還保持着他進圖書館的習慣，也是事實。那時他和陳琬女士已經結婚，人們常見他們儼影雙雙出入於圖書館門口。錯覺與遺忘的綜合，以致多年後偶然也聽到有人說他的愛國熱情很快就消失的談論。這也許是人們不了解他當時生活貧寒的情況。他當時連應繳的幾元學費也繳不起，是經常靠譯書、寫文、賣稿費過活。抗戰軍興之後，我們分別走向天南地北，於他的生活經歷，我確乎不甚了解了。似乎他沒有走上戰場，

去經受炮火的洗禮，而是留轉在當時的所謂大後方，在求職業、也做學問的道路上輾轉，我想這與他當時已經有家室子女的牽累，不無關繫。這若從嚴格的政治意義上講，自然也未始不可檢討其中的得失，作“春秋責備賢者”之論。然而社會環境際遇是複雜的，人們所能走的路也並不能盡同。同時有兩件事是我所記得的：一件是，一九四二年秋我初到重慶訪見他的時候（他當時在一家半官方的出版社工作），他第一句叮囑我的話是說：“你初來這裏，說話可要格外小心。”這話意味着什麼，我是心領神會的。另一件事，大約是一九四五年冬天政協會議前後，不記得是從什麼地方見到一張小報上記載着貴州大學師生要求實現國內和平與民主的消息，當我從中看到德昭的名字時，知道老朋友的心聲與時代的脈搏仍然是相通的，感到欣慰。

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二年秋，曾和德昭在貴州大學共事的老同學呂熒來到我所在的一座濱海城市的大學裏，我們朝夕相見。我向他打聽德昭，原來他們於抗戰勝利不久就同到台北去教書了。呂於開國前後趕回北京來。從呂熒的話語裏，我知道德昭也是很想回來，但他的一家數口，不能像呂熒說走就走那樣容易。從此我以為德昭是被隔阻在海峽的對岸了。二十年過去後的一九七三年冬，從一位出國的新聞代表團領隊人（也是位北大老同學）那裏，突然聽說在香港遇到德昭，現在中大任教的消息。至於他何時離開台北，又經歷過哪些國家，最後才來到香港，當時都無所知。然而當時還不便立即寫信給他，拖到一九七八年冬我才又能有機會和他借通訊取得聯繫。這就是上文所說的睽離三十五年之後，在北京中醫院病床前我們又重獲把晤的來歷。

這次重得通訊和見面的開始，他都一再提出晚年“正首丘”（回國內來）的想法，因此，也可以判定，他雖飄流海外多年，始終是眷懷祖國，對新中國的成就是高興的。然而他的最後願望終於沒有來

得及實現而讓他含恨以歿，傷哉！

德昭精通英、法、日語，漢語根底也好。他的中西歷史都具有深厚的基礎。他還向我自信地表示過在中西交通史上也下過一番工夫。他把他在海外參加學術會議的報告和他發表的學術論文，在這次會晤前後都寄給了我，重點是對甲午到五四期間的政治與文化思想的研究，中山先生思想更是他研究的核心。我雖然直到現在僅僅粗略地涉獵過幾篇，但留給我的印象，可以看出都是扎扎實實的謹嚴之作，絕不是率爾操觚的東西。中華書局已準備把他的遺作印成專集問世，我覺得這是很值得的。

就在德昭到醫院見我前不久，遠在蘇州師範學院執教的余行邁（原名余文豪）同學，忽然寄信給我附來一張我們北大同班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北大二院的禮堂前。上有十八人，德昭立於前排正中。開始，我們從人數與服裝上作了各種推想，判不清是在什麼情況下留的這張照片。行邁信上說，這張照片於十年動亂中曾經失去，經過撥亂反正，隨着政策的落實，又璧還回來的。於是他複印數張分送現還知消息的諸同學，也寄德昭一張。德昭似乎也記不清當時的情況了。後我問起同班同學、現任甘肅師大的歷史系教授金寶祥兄，他斷然地說，這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一六之後，歡迎德昭和另一被捕同學巫省三被釋出獄的紀念照；當時是在二院禮堂旁一間房內先開的歡迎茶會而後拍照的。寶祥兄的記憶是十分清晰的，這就成為對德昭以及在我們大家個人生活中很值得保存的珍品了。檢點照片上的十八人，現在有的在國內，有的在國外，有的在台北，有的已經故去，還有的是不知下落，有可能是在戰場犧牲了。我當時正在醫院養病，反復地看着這張照片。緬懷着年輕時代的老同學，謫詩兩首，今以之附贅於此文的末尾；原是睹物懷舊之作，而竟成追悼德昭的紀念品，這是怎麼也料不到的。

〈題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同班照片〉

負笈紅樓憶少年，東西齋對漢花園。
心期班馬千秋業，呼號街頭臘月天。
豪氣未消添白髮，遠懷無奈望嬋娟。
寄言彼岸舊朋侶，北海春歸好放船。

偶留鴻影落人間，一度沉淪去復還。
入目猶堪識舊我，沉思彷彿悟前緣。
死生有命誰先後，離合無情自北南。
缺補金甌應有日，散雲歸岫月重圓。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 (1) 這個扯破床單製旗幟的人，有人回憶是住東齋的劉志誠同學。
(2) 一九八〇年德昭來京談起這事，解開了大家多年記不清的一個謎。
(3) 原信現在收入《中國現代革命資料叢刊：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印。

(4) 見王德昭《鏗然舍瑟春風裏》（述往事為鄭天挺師壽）（南開大學專刊）。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目 錄

王德昭教授之生平事畧.....	王陳琬(1)
追念王德昭教授.....	孫思白(1)
黃遵憲所見之日本.....	(1)
1979 年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香港)論文	
黃遵憲與梁啟超.....	(20)
《新亞學術年刊》第十一期, 1969年	
譚嗣同與晚清政治運動.....	(53)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1974年	
晚清的教育改革與科舉制度的廢止.....	(93)
《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之一篇	
清季一個知識分子的轉變——秦力山研究.....	(171)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981年	
知識分子與中國同盟會.....	(204)
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廣州)論文, 1979年	
五四運動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影響.....	(232)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五卷第一期, 1979年	
第一次聯俄聯共對於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	(257)
Leverhulme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1979年	
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最後發展.....	(280)
1977年亞洲歷史學家會議(曼谷)論文	